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比较文学与 中国现代文学

乐黛云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

乐黛云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

乐黛云 著

责任编辑：张文定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34千字

1987年8月第一版 1987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2,400册

统一书号：10209·162 定价：平装 2.10元

精装 3.95元

Peking Universit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Yue Daiyun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序

乐黛云同志把她写的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集成了一个集子，要我写几句话。我立刻就承担下来。这并不是因为我自认为是什么专家，有资格这样做，而是因为我考虑到她这一部书很有用处，很有水平，而且很及时。杜甫的诗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我很想把这一部书比为“当春乃发生”的及时好雨。

何以说这一部书是及时的好雨呢？最近几年以来，我国文艺理论界对比较文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青年学生对比较文学更是异常热爱。但是可惜的是，在国际上这一门不算新兴的学科，已经相当流行了，而对我们许多人还很陌生。由此就产生了一种不协调的现象：兴趣与知识不成比例。兴趣大而知识少，算得上一个反比吧。救之之法就是多做启蒙工作。

乐黛云同志在一部分论文中正承担了这个启蒙的任务。她介绍了外国流行的许多文艺理论流派：新批评派、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接受美学、叙述学、诠释学、复调小说等等。通过她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这些听起来非常新奇的流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只是停留在名称上。

但是请读者切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认为这一部书只是一个启蒙读物。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说，书中有几篇文章起了启蒙作用而已。我们一方面不能否认启蒙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全书的价值决不仅仅是这一点。作者在那几篇谈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章中，使用了新方法，根据新理论，又结合中国固有的理论传统，比较了尼采、左拉与茅盾。她对茅盾

这一位现代中国伟大作家做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了许多具有极大启发性的看法。她对另一个伟大作家鲁迅的思想和艺术也进行了探讨，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她的论文《尼采与现代中国文学》发表后，得到了广泛的赞扬。大家感到，她的论文给中国文艺理论界吹来了新鲜和煦的风。

我想，读这一本书的人都会同我一样感到这一阵风的吹拂，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作者以开辟者的姿态，筚路蓝缕，谈到了许多问题，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给人以很多的启发，让人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如入宝山，不知道捡哪一块宝石为好。接着上面引用的杜甫的诗再引上两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一部书难道不象是“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吗？

近几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甚至连一些国外的同行们，都大声疾呼，比较文学中不能缺少东方文学，要建立世界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我完全同意这个呼吁。但是什么叫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呢？这一个学派的特点何在呢？虽然有个别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还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我个人认为，我们目前先不要忙着下什么定义。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做些切切实实的工作，先就自己的研究范围，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能力，再借鉴一下外国，努力钻研，深刻探讨，写出一些文章。鲁迅说过：“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我们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脚底下，从没有现成的道路，只要我们走上去，锲而不舍，勇往直前，在个别时候，个别的人，也可能走上独木小桥，但是最终会出现康庄大道。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祝愿这一部书象“知时节”的“好雨”一样，遍洒神州。

季羨林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八日

序

乐黛云同志的论文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个书名起得好，它不仅是本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也不仅是表示本书包括了比较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这两方面的内容，而且说明了作者治学的经历和途径、方向和特点，读后是可以从她的经验和成果中得到一些启发的。

建国初期，“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程开始登上了大学的讲坛，成为中文系的必修课。在这门学科的草创时期，乐黛云同志参加了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同她共事的过程中，我感到她不仅热情好学，而且思想锐敏、视野开阔，不满足于学科水平的现状，经常提出新的问题并力图加以分析和解决。虽然她曾经历过政治生活上的坎坷和曲折，但这些特点是一直保持下来的。正是在长期钻研的过程中她感到由“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同外国文学的关系是必须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而且必须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于是她从中国现代文学出发，逐渐把兴趣和方向集中到比较文学方面。她为此下了许多功夫，并到美国专门考察研究了三年；深入了解了国际上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现状和学派，他们进行文学研究的思路的方法，以及外国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看法。应该说，这类知识在中国还是比较陌生的，因此她的这方面的文章都带有一定的开创和介绍的性质。但它对我们不仅有开拓视野、可资借鉴的作用，而且对现代文学本身的研究也是十分有益的。

从本书中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那些论文和它所显示的特色，就可以看出作者治学的着眼点和达到的深度。《五四以前的鲁迅思想》是写作较早的一篇文章，但它已把视野扩展到晚清，并注意到鲁迅与尼采的关系。后来在《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中就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她首先指出尼采最初是以文学家的身分被介绍到中国的，接着根据详细可靠的资料，全面考察了尼采思想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现代文学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文章结合中国社会及思想界实际，具体分析了尼采思想所产生的不同的社会效果；特别是着重分析了它和中国现代几个伟大作家鲁迅、茅盾和郭沫若的关系，尤见功力。其中除鲁迅与尼采曾有人作过研究外，对茅盾与尼采关系的分析尚属首创；而且论证紧密，颇有创见。作者着重分析了中国作家从“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和树立不怕孤立的斗争意志出发，为了反封建的需要，才接受了尼采的影响，因而主要作用是积极的；但即使在二十年代，中国作家对尼采的以强凌弱等主张也是有所批判的。作者还分析了四十年代的“战国策派”鼓吹尼采思想的动机和反动作用，因而得出了一种外来思潮“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的结论。可以看出，这里所显示的作者研究问题的角度和方法是必然会把她引入比较文学的道路和方向的。

作者对茅盾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茅盾早期思想研究》一文已强调指出茅盾“不断根据中国社会斗争的实际需要，广泛接触、批判吸收外国思潮”的开阔的胸襟；在《〈蚀〉和〈子夜〉的比较分析》一文中，更就茅盾的主要作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她引用朱自清说的《蚀》是“经验了人生写的”，《子夜》是“为了写而去经验人生的”评语。对两部作品加以比较分析，从创作准备和创作意图、材料来源和生活基础、艺术结构和心理描写，以及语言风格等方面，都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和分析。特别是比较了《子

夜》和左拉《金钱》中的主要人物，来说明《子夜》成就的那部分，尤有深度。她的关于现代文学的其余一些文章，也都具有类似的方法和特点。

在关于比较文学的原则和方法的多篇文章中，作者不仅介绍和引进了许多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强调了运用比较的方法有助于理解文学的本质特征，强调了开阔视野和运用比较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者对创建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十分热心，本书中的这方面的文章虽然以倡导和介绍性质的居多，但因为它对许多人还是陌生的和新鲜的，仍然具有重要的开拓作用。比较文学具有总体研究的特点，它可以启发人们对文学研究进行宏观审视，以求取得理论上的突破。各种不同的新的研究方法也都在一定适用范围内有它的长处，可以供我们考察问题的借鉴，因此这些文章对读者是非常有用的。

我自己对于比较文学的理论和各种新的方法也是很陌生的，但从乐黛云同志的道路和成果中感到一点启发：就是每个人如果能根据自己的精神素质和知识结构、思维特点和美学爱好等因素来选择结合自己特点的研究对象、角度和方法，那就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智，从而获得更好的成就。乐黛云同志的治学道路显然有与她个人的知识面宽广和具有开拓精神等素质有关，但它却能给人以普遍性的启发，特别是在当前各种新学科、新方法纷至沓来的时候。因此我愿意将本书推荐给爱好和研究比较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读者。

王 瑶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日于北京大学

目 录

序一	季羨林 (1)
序二	王 瑶 (3)

中国比较文学的现状与前景	(1)
比较文学的名与实	(27)
比较文学发展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37)
比较文学研究的几个方面	(54)
中国文学史教学与比较文学原则	(67)
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	(71)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国外	(77)
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	(88)

五四以前的鲁迅思想	(117)
论《伤逝》的思想和艺术	(137)

鲁迅属于全世界

——《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前言	(154)
----------------------	---------

茅盾早期思想研究	(158)
----------------	---------

茅盾的现实主义理论和艺术创新

——为悼念茅盾同志逝世而作	(182)
---------------------	---------

《蚀》和《子夜》的比较分析	(205)
---------------------	---------

二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心态的探索

——论茅盾的《蚀》与《虹》	(229)
---------------------	---------

漫谈茅盾的抒情散文 (241)

《雷雨》中的人物性格 (249)

小说世界的外延研究

——传统的小说分析 (257)

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

——新批评派与小说分析 (263)

决定着表达方式的深层结构

——结构主义与小说分析 (272)

潜意识及其升华

——精神分析与小说分析 (284)

作品的框架与意象的挖掘

——接受美学与小说分析 (293)

事序结构和叙事结构

——叙述学与小说分析 (301)

“推末以至本”和“探本以穷末”

——诠释学与小说分析 (311)

后记 (318)

中国比较文学的现状与前景

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总趋势

1958年，在美国北卡罗来州教堂山召开了著名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届年会。会上美国学者韦勒克 (René Wellek) 作了奠定他一生在比较文学学术界威望的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挑战性发言。韦氏认为艺术品是“一个符号结构，但却是一个有含义和价值，并且需要用意义和价值去充实的结构”。这个“结构”一旦产生，它就完全不同于作者在写作时的大脑活动过程，而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他指出：“在作者心理跟艺术作品之间，在生活、社会和审美对象之间，存在着一条被人们正确地称为‘本体论的沟渠’。我已把艺术作品的研究称之为‘内在’，而把对艺术作品与作家思想的关系，艺术作品与社会的不关系的研究称之为‘外在’。”^① 这样把艺术作品与作家和作家的社会生活环境截然分开，在“内在”和“外在”之间划出一条鸿沟显然是错误的（后来韦勒克本人也修正和发展了自己的观点），然而，在当时情况下强调“内在的文学性”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指出文学研究必须“将文学作为有别于人类其它活动及其产物的学科来研究”，并从而提出“比较文学的危机”则对世界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韦勒克认为比较文学的危机表现为以下三方面：一、内容与方法之间的人为界限；二、渊源和影响的机械主义概念；三、民族主义的、为本国文学评功摆好的强烈愿望。

^① 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见《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页。

所谓“危机”的关键在于第二点。当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欧洲已有七十多年历史，特别是法国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绩，但他们大都强调“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的和民族的边缘，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在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①他们甚至强调：“比较文学主要不考虑作品的独创价值，而特别关怀每个国家、每位作家对其所借取材料（emprunts）的演变”^②。这样就把比较文学限制在很狭窄的范围，并越来越脱离对文学本身的研究。难怪韦勒克要攻击他们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二国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使比较文学变得仅仅注意研究外部情况，研究二流作家，研究翻译、游记和媒介物”，“使比较文学成了只不过是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这样，也就不可能从总体上来完整地研究一部艺术作品，因为“没有一部作品可以完全归因于外国的影响，或者被视为一个仅仅对外国产生影响的辐射中心”。这样的研究只能脱离“文学”本身而被淹没于社会心理学研究、文化史研究等“外在”研究之中。

韦勒克反对法国比较文学学者梵·第根（Van Tieghem）把比较文学定义为“研究两国文学间的相互关系”，而“总体文学则着眼于席卷几国文学的运动和风尚”，因为两者之间并无方法论上的不同。例如研究历史小说家司各特（Walter Scott）在法国的影响本身就是“浪漫主义时期历史小说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认为，这种人为的划分只会引起混乱。

对于那种把比较文学当作“文化功劳簿”，“竭力论证本国施与他国多方面影响”的倾向，韦勒克也提出了批评。他还特别谴责

① 马·法·基亚（M.F.Guyard）：《比较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② 卡雷（J.M.Carré）：《比较文学·序》，转引自张汉良：《比较文学研究的方向与范畴》载于《中外文学》6卷10期，第99页，1978年，台北。

了那种只要撰文说明普希金的金鸡故事源出于华盛顿·欧文，就被指斥为“没有根基的膜拜西方的世界主义者”的“政治教条主义现象”。

韦勒克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却没有作出自己的回答。他只是强调“比较文学已经成为一个确认的术语，指的是超越国别文学局限的文学研究”。然而，仅此一点已足以为比较文学在美国的发展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

韦勒克的发言引起了空前热烈的反响。激烈的批评首先来自苏联。1960年1月，莫斯科召开了讨论有关“文学联系与相互影响”的会议，1962年10月又在布达佩斯召开了讨论东欧比较文学的国际会议。两次会议的重点都是批评韦勒克的“形式主义”和“世界主义”。苏联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聂乌帕科耶娃强烈指责韦勒克“把民族性溶合于普遍性的世界主义”和只强调艺术作品“本身”的“狭隘的形式主义”的分析方法。她认为“韦勒克对比较文学所提出的任务并不是从整个民族多面性的角度来研究活生生的文学史过程，而是把被分析的作品从那些构成作品的社会内容和民族特征中‘解放出来’”，同时，“文学间的民族界限被抹掉了，因而每一民族对于世界艺术文化的独特贡献被溶合在某种人为构造的‘全球’文学之中”^①。聂乌帕科耶娃正确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比较文学应“揭示每一个民族文化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以深刻了解它对世界文化的贡献，确定它在不同阶段和不同社会条件下发展的规律性，促进富于民主主义的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②。大会还批评了“欧洲中心论”的倾向，提出应重视东西方比较文学的研究，并谈到中国文学在日本的影响

① 聂乌帕科耶娃：《美国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及其与反动社会学和反动美学的联系》，见《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第344—346页。

② 同上。

以及中国文学与他国文学的联系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小说^①。

1966年在美国出版了法国比较文学著名学者艾金伯勒的专著《比较文学中的危机》(原名《比较不是理由》)。艾金伯勒实际上接受了大部分韦勒克的观点。他提出比较文学就是“人文主义”，主张把各民族文学看作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和相互依赖的整体，而比较文学正是促进人们相互理解、有利于人类团结进步的事业。他认为：“文学的比较研究，甚至对那些相互之间没有影响关系的文学的比较研究会为当代艺术的复原作出贡献^②。例如关于毫无联系的诗的结构比较分析就会帮助我们发现诗歌或小说本身必须具备的特性。他认为“研究文学类型的历史演进”(即渊源、影响和交流)和“研究不同文化中创造出来的与文学类型相当的每一种形式的性质和结构”同样重要。在他看来，所谓“外在”的有关“历史的演进”和“内在的”有关“美学的沉思”，两者不但不对立，而且必须互相补充并结合起来。因此，既要研究“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中国)道家学说在欧洲的传播”，“二十世纪美国电影对法国的影响”这类历史性课题，也要研究象“‘能乐’和悲剧”、“‘狂言’和闹剧”之类的相互之间并无事实联系的理论课题。艾金伯勒说：

历史和历史主义并不总是进步的，而美学也并非总是反动的；它会有助于发展这么一种比较文学：它将历史方法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将案卷研究与“本文阐释”结合起来，将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从而最终一举赋予我们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课题和一些恰当的方法^③。

① 见康拉德：《东方各民族文学与一般文艺学问题》及谢马诺夫：《文学联系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小说发展的作用》。

② 艾金伯勒：《比较文学中的危机》第3章《比较文学的目的、方法、规划》，见《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第117页。

③ 《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第102页。

艾金伯勒的功绩在于他沟通了偏重于历史方法的影响研究和偏重于美学评价的平行分析，并开始把两者结合起来。

真正体现了这十余年论辩成果的是韦勒克本人写于1970年的《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和同年在巴黎出版的勃洛克(Haskell M. Block)的小册子《比较文学的新动向》。

韦勒克强调比较文学是一种没有语言、伦理和政治界限的文学研究；它的目的是从国际的角度来研究一切文学，因为一切文学创作和经验都有统一的一面，因而存在着从国际角度来展望建立全球文学史和文学学术这一遥远的理想。它的研究范围既包含“历史上毫无关系的语言和风格方面的现象”，也包含历史上的渊源和影响。韦勒克说：“研究中国、朝鲜、缅甸和波斯的叙事方法或抒情方式，同研究与东方的偶然接触——如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一样名正言顺”。也就是说，比较文学不但研究文学史而且也研究理论和批评。因此，比较文学所用的方法就不能只限于“比较”，而要和运用“比较”一样频繁地去运用“描绘、特性刻画、阐释、叙述、解说、评价”等种种方法^①。

勃洛克更明确地提出：“比较文学主要是一种前景，一种观点，一种坚定的从国际角度从事文学研究的设想”。正因为“时代赋予学者以世界公民的身份”，因此人们越来越可以“摆脱民族和语言的束缚，以便使文学研究接近文学的本质，也越来越转向比较文学”。他认为“比较文学家确实是专攻国际文学的学者”。他强调比较文学本来就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的特点就在于“边缘”。他反对给比较文学“下精确细致的定义”，反对“把它上升为一种准科学体系”，反对“把一个体系强加给一门不受体系束缚的学科”，因为这样一来就会取消这一学科的“边缘”性质^②。

① 《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第144页。

② 《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第197页。

七十年代以来，世界比较文学大体就是沿着韦勒克和勃洛克所提出的开放性方向发展的。关于比较文学名称和性质的讨论大致告一段落。

比较文学无论是通过不同语言现象和表达方式探索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还是研究某一文学现象在国际范围内的渊源流变都取得了很大进展。

首先是关于文学共同规律的探索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兴趣。苏联学者日尔蒙斯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过程”决定着文学也有自己发展的共同过程。“比较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可以确定在社会制约中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①韦勒克也认为“文学是一元的，犹如艺术和人性是一元的一样”，所以“重要的是把文学看作一个整体，并且不考虑语言上的差别，去探索文学的发生和发展”^②。他们的出发点显然不同，但承认和探讨文学的共同规律则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某种文学现象的传播、接受和发展也取得一定成绩，正如美国文学批评家佩恩（William M·Payne）所说的：

从进化角度研究文学，愈益趋向于成为一种比较研究。

如同在某处被打乱了或突然中断的地质岩系，能在别处发现它在继续延伸那样，文学体裁中的某些发展线索在某一民族的产品中业已在某种程度上清理就绪之后，我们若把研究努力转到别的区域，便能从这一点出发，更好地勾勒出这些发展线索的脉络^③。

从前者出发，比较文学愈来愈趋向于理论化；从后者出发，比较文学日益趋向于“从国际角度来展望建立全球文学史和文学学术”，这就不能不日益重视距离遥远的更广大、更不同的文学体

① 《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第285页。

②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45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③ 《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第195页。